

宗
教
學
講
義

任
繼
愈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宗教學講義

任繼愈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学讲义 / 任继愈著.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13 - 5142 - 8

I. ①宗… II. ①任… III. ①宗教学 - 文集 IV.
①B9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8324 号

责任编辑: 初小荣

书名 宗教学讲义

著者 任继愈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6.75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6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5142 - 8

定价 26.00 元

任继愈——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代序)

李 申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任继愈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大学给宗教专业本科生讲课的讲义的一部分。该讲义本来准备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整理完毕。已经整理出来的这一部分,曾经先生本人修改和审定,其中个别章节,曾被先生编入《念旧企新》一书。其他部分,先生逝世后,曾被编入《任继愈宗教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这部讲义的独立价值,现予以单独出版,以飨读者。

任继愈先生研究宗教,起因于他要弄清中国哲学中的宗教哲学问题。而他之所以要选择中国哲学这个专业,起因于他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当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青年人心目中的真理,首先是救国救民的道理。也就是说,任继愈先生对于哲学和宗教的研究,是要自觉担负起历史的使命,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共有的理想和追求。

任继愈先生早年研究宗教的状况,见于他的学位论文《理学探源》和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几篇讨论佛学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任继愈先生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一起,开始学

习马克思主义。过去只是在实践中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现在又从理论上认识到,过去所信奉的儒学的“亲仁”、“爱民”之类,都是虚的,即使古人真的如此想,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在书本学习之外,他们还参加了土地改革等社会活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在感情上也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任继愈先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思想道路。

一、以自己的著作提供用马克思主义 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范例

任继愈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从佛教开始。第一篇论文,是1955年的《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这是他和自己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合写的。此后,就是对于隋唐佛教四大宗派哲学思想的研究。1962年,在哲学讨论会上,发表关于佛教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演讲,第二年,以《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伴随着这些文章,是对范缜《神灭论》和僧肇《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的今译,对胡适禅宗研究的批判,这些文章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于1963年出版。从1942年撰成《理学探源》到1963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任继愈先生对佛教的研究,已经有了二十年的积累。所谓“十年一剑”、“厚积薄发”,用于形容任继愈先生的佛教研究,可说是恰如其分。毛泽东主席说的“任继愈发表”的、“如凤毛麟角”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几篇谈佛学的

文章”^①,指的主要就是这个文集里的几篇文章。

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的批语,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关注宗教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端。这个开端的奠基之作,就是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研究佛教的文章,同时也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一般宗教问题的范例。所以,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之后,接着就说“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就是说,他期待着中国能有人像任继愈先生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撰写出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研究文章。

依任继愈先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于思想史研究,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社会存在的延续和发展,就是人类的历史。因此,如果是研究宗教发展的历史,则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又可表述为“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

依据用历史说明宗教的立场,任继愈先生指出,佛教从它的产生到派别的分化,从小乘发展为大乘,都不是佛教教义自身在发展,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在推动着佛教教义的发展。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而南亚一带却主要是小乘佛教。至于藏传佛教,则又是一种面貌。这些演变,都不能从佛教教义本身找到答案,也不能从某些天才人物的活动中找到答案,而只能求助于当时当地

① 毛泽东《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1963年12月30日。

的社会生活条件。因此,不是佛教观念改变了印度或中国的历史,而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推动了佛教观念的诞生和传播、演变和发展。载入佛教丛书《大藏经》的佛经连同它的注本近三千部,但真正流行的只是很少几部,这也只能用它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解释。

在任继愈先生之前,不少佛教研究者都注意到,佛教传到中国,其教义发生了许多改变。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僧人没有正确理解佛经,“误解”了佛教的本来面貌。任继愈先生指出,佛教在汉代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在魏晋时代被理解为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已经大量翻译,应该不会被“误解”,但是广泛传播的,却是经由中国僧人发挥的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而比较忠实于印度原貌的法相宗,却很快就失传了。这些现象,也只能归结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存在影响了社会意识,而不能从人的主观愿望上去找原因。

毛泽东主席 1959 年接见任继愈先生时说过,许多梁启超没有讲清的佛学问题,任继愈先生讲清楚了。比如,佛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诸法无我”,是所谓佛教“三法印”之一。梁启超信仰佛教的“无我”论,认为“无我”论可以给人以积极意志。然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许多人批评“无我”论,认为这恰恰是使人消极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难以自圆其说。再比如,梁启超考证《楞严经》是伪经,然而,这部伪经流传甚广。此外还有《法华经》《维摩经》等,也在中国广泛流传。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经的译文优美。可是,玄奘的译文几乎可以说是译文中最优美的,但法相宗却很快衰落。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也说不清楚,或者说,说不正确。如果要进一步追问,那些根本不在数次结集之内、释迦牟尼去世数百年以后才出现的大乘经典,其“非佛语”的性质非常明显,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呢?

梁启超二十几岁时就和康有为一起鼓吹变法,“康梁”并称,不仅名动中国,而且名扬海外,是少有的不世之才。在佛教问题上,梁启超所缺乏的不是才能,而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用历史说明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任继愈先生自觉而准确地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宗教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著作,给研究者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二、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机构, 规划宗教学实施方案

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64年,任继愈先生开始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问题的学术机构。最初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教研室的教师和国务院宗教局的干部。同时从全国范围内选调对宗教问题有所研究的学者。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研究所发展到近三十人,任继愈先生担任所长。研究所最初设在北京大学,1965年,转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依任继愈先生的设计,宗教研究所尽量减少行政人员,除一名专职会计外,其他行政事务都由研究人员兼任。任继愈先生当时给研究所规定的任务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为宗教学的繁荣,准备条件。

宗教研究所刚刚成立,科研活动尚未开展,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自然无法开展,任继愈先生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对宗教研究所的领导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宗教研究工作才真正开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任继愈先生除自己的研究之外,对整个国家的宗教研究,主要是做了三项工作。一是聚集人才,发展宗教研究所规模,并协助和指导其他宗教研究机构的建立;二是制订宗教研究规划,并亲自领导和实施宗教研究项目;三是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二十余年,支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研究项目,扶持新生力量和薄弱领域的研究。在这期间,究竟批准和支持过哪些宗教学项目,有案可查,此文不赘,这里只谈谈前两项工作。

宗教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以后聚集的人才之中,有曾为名牌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因被打成右派当时在做资料员的,有曾为著名佛学专家弟子当时担任着某大学系主任的,有曾为北京大学高材生因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做牧羊人的,有曾为某大学西语系教师因反对下乡劳动被开除公职当时在做临时工的,有曾为某著名出版社总馆协理因被打成右派当时仅为普通编辑的,有解放战争中的老英雄,也有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只要该人确实有才,在做宗教学研究或者愿意从事宗教学研究,或者是宗教研究所需要的,任继愈先生都千方百计,把他们聚集在宗教研究所。鼎盛时期,宗教研究所曾经有一百零八人,被称为“一百单八将”。有的人才无法调进北京,任继愈先生就努力支持在当地创办宗教研究机构。比如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建立,就曾经得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任继愈先生的大力支持。随着宗教研究的开展,现在几乎所有省份的社会科学院都有了自己的宗教研究机构。

现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数大体稳定在七八十人左右。即或如此,也是目前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宗教学研究机构。

为了培养宗教学后继人才,任继愈先生和北京大学协商,在北京

大学创办宗教研究专业。最初的教师,就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任继愈先生亲自授课。这里发表的部分“讲义”,整理于1982年。直到1985年,先生仍然在讲授这门课程。而根据先生讲课的特点,是每一次讲完课后,他都要认真总结,找出缺点,以便下次改正。可惜的是,在这数年中间,他对于这个讲义又做了多少修改,未能记录下来。

如何开展宗教学研究,是“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任继愈先生就认真考虑的问题。1979年2月,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与会的有老一辈的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还有宗教界的领袖和学者,共一百三十余人。这次会议由宗教所牵头,也就是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画出了第一张蓝图。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选举任继愈先生为会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学学术团体。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任继愈先生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宗教问题的杂志。

数十年后,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朱锦昌讲道:“正是由于四十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诞生,才有可能在当时聚集起一支精干而宝贵的宗教研究队伍,十年浩劫一过,便以高昂的士气、整齐的步伐,迅速投入了学科建设的热潮;正是由于四十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牵头制订了全国宗教学研究的长期规划,才有可能出现后来国内宗教研究机构、研究课题的相继设置和分工合作。”而这一切,也都是和任继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培养宗教学后备人才,1978年,任继愈先生决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研究所一起招收研究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虽然成立已十多年,但和其他许多研究所相比,乃是一个

新所,师资力量相距甚远。而宗教学又是一个新开辟的学科,急需培养人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当时几乎是唯一具有带研究生资格的任继愈先生,只能自己尽量多承担教学任务。

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总共有二十三名,挂在任继愈先生名下的有十七名。从1979年开始,研究生数量多少不定。最少时二三名,最多时也有七八名,大都挂在任继愈先生名下。授课老师不足,任继愈先生自己担负三门课程。这对于一个既担任宗教所所长、又有繁重研究任务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然而任继愈先生后来不无歉疚地谈起这种情况说:“很对不起你们。这么多人,我只能‘放羊’了。不像××,那时候就他一个,每周来我家里一次。他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手把手地教他……”“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许多青年就没有求学的机会。”实际上,不仅是不少青年将失去求学的机会,宗教学人才的培养,也难较快发展。而当时的研究生院领导几乎是一致认为,任继愈先生是研究生院最负责的导师之一。1985年第二期《高教战线》刊登《任继愈教授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一文,就是对任继愈先生指导研究生工作的肯定。

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杜继文先生在《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①一文中说道:“至于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宗教研究所做得最为成功的一项事业。当前国内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绝大多数出自世界宗教研究所系统,而且大都能各领一方,各有建树。”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也是任继愈先生。

^① 《国际儒学研究》第15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

三、具体指导宗教学研究,为宗教学的 繁荣进行资料 and 理论准备

就在宗教学规划会议和成立宗教学学会的同时,任继愈先生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①,并且身体力行,主持并具体指导了一系列宗教学研究项目。

首先是《中国佛教史》,这是他从做研究生时就认真钻研过的领域,并且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事可做的日子里,他给自己规划的学术任务,就是编一部《佛教辞典》,并且收集资料,撰写条目,做了许多工作。“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作为他多年深入探讨的领域,首先组织了《中国佛教史》的写作。该书计划八卷,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出版了三卷。然而就是这三卷,也在国内外学术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早在《中国佛教史》出版之前,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就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日本研究佛教的前辈学者冢本善隆在20世纪70年代,带着自己密密麻麻圈点过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到中国,要专程拜访任继愈,探讨佛教研究问题。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不仅在中国是开创性的,在国际上,也是以前所没有的。此后不久,《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译为日文,名《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由于这本书,任继愈先生和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中村元、镰田茂雄等建立了学术上的友谊,加上日本《中外日报》社长本间昭之助的促进,遂

^① 《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

建立了以“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为名的、分别在两国定期举行的学术交流平台。中日佛教学术的这种交流方式,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由于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平台的建立,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自然也引起了日方的关注,并被译为日文。译者评论说,这是一部有特色的佛教史著作。其特色,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说明,不是机械论的运用。

为了给大学生们进行宗教知识的教育,国家教委曾委托任继愈先生主编一套宗教知识丛书。当时确定的书共有五本:《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原理》和《道教史》。除《道教史》委托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主编以外,其他四本分别由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杜继文、唐逸、金宜久和吕大吉担任主编,任继愈先生任总主编。任继愈先生不仅和各分册主编详细讨论书的撰写问题,而且几乎是一次不落地参加每个分册的学术讨论。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成为我国宗教学各主要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其中的《佛教史》在出版后不久,台湾就出版了繁体字版。其出版说明中指出,该书作者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立场,和台湾现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但该书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在于“观察历史有其特殊的角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成果,也得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的承认。

在道教研究方面,任继愈先生在主编《中国佛教史》的同时,主编了《道藏提要》。目前该书已经出版第三版,成为研究道教的基础性著作;主编了《中国道教史》,目前也已经出版第二版。

为了给刚刚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提供理论武器,任继愈先生组织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了《马恩列斯论

宗教》。为了给初涉宗教学的学者们提供有关宗教学的基本知识,任继愈先生组织当时所能找到的全国范围内的力量,主编《宗教辞典》,1981年出版。这部辞典重印了多少次,已难以统计。但影响既大且广,则是事实。这部辞典后来向大的方向发展,扩大为《宗教大辞典》;向小的方向发展,又被按教门划分为数个“宗教小辞典”。出版不久,在台湾就出版了它的盗版。台湾某佛教团体编纂的《佛教大辞典》,则将《宗教辞典》中的佛教教义条目加以转录,不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全部收入。这是社会各界,包括台湾的宗教学界对于由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的宗教研究成果的承认。

继《宗教大辞典》之后,任继愈先生又主编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计划编纂的《佛教大辞典》。这部《佛教大辞典》与其他佛教大辞典自然有许多不同。但其“持论之严谨,学术立场之公正”,则是中外学术界的一致意见。

就在上述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任继愈先生又主持了大型的宗教学项目:整理并出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历时十余年。这部书的整理出版,为我国宗教资料的整理,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个基础上,任继愈先生又接受国务院的委托,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可惜的是,“续编”尚未完成,任继愈先生就永远离开了他终生奋斗的工作岗位。

由任继愈先生主编或指导的宗教学著作,都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础性著作。

四、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 提出“儒教是教”说

儒教是不是宗教？是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基本问题。在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之前，中国的儒者，没有一个否认儒教是宗教的。或者说，中国的儒者都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性质的社会现象。不同的仅仅是，在儒教看来，儒教是正教、大教，而其他宗教不是。外国学者，包括传教士，除了利玛窦及其追随者之外，也无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只有利玛窦，在给梵蒂冈的汇报中说，儒教不是宗教，儒者们的祭孔、祭祖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因此可以允许中国基督教徒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进行祭孔祭祖活动。然而梵蒂冈教廷从来没有承认过利玛窦的意见，包括不承认利玛窦把 deus(英文 god)译为“天主”或“上帝”。利玛窦一死，其继任者龙华民即否定了所谓“利玛窦规矩”，不再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从而引发了延续三百余年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信仰问题的所谓“礼仪之争”。

至于利玛窦本人，也很难认为他真的就认为中国儒者祭孔祭祖不具有宗教意义。因为在他并不准备发表的、具有临终遗言性质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十章《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中，首先介绍的就是儒教。并且明确指出，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天，或称上帝，只有皇帝才可祭祀这位最高神祇，只有大臣才能祭祀山川和宇宙四方的神灵。这可以说是对儒教最基本问题的正确描述。

因此,正式否认儒教是宗教的,仅仅开始于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此后是蔡元培。蔡元培在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以前,曾不只一次地明确指出,儒教就是宗教。他否认儒教是教,是在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再后就是陈独秀,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由于这三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非常强而有力的人物的推动,“儒教不是宗教”的判断几乎是未加讨论,就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撰写中国各种历史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者,几乎都以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而感到自豪。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儒教是教说,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全是反对的声音;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全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之外,对于儒教是教说,不仅仅是反对或不赞成,甚至是嘲笑和鄙视。然而任继愈先生坚持着。他指出,宗教、迷信和神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国家对宗教有过免疫力,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宗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因此,儒教是宗教的结论,不仅是对于一个具体研究对象性质的认定问题,而是关系着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问题,即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国,其思想发展能否脱离人类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儒教是宗教的论断还提出了宗教学上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才是宗教?在一般宗教学原理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这个论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任继愈先生深厚的宗教学素养,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任继愈先生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所应有的学术严肃性。

时至今日,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成倍地增多起来。这个判断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全面承认,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也是任继愈先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五、坚持科学无神论立场,把“批判神学”作为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重要任务之一

任继愈先生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不讲无神论,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不批判神学,那就是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最本质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宗教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虽然也难以完全避免主观性,但是毕竟有达到客观的可能和条件。但是宗教学学科,在事实的认定方面,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也可能达到一致,但是在神祇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要纯粹描述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会显露作者的倾向。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研究神学问题,本身就是对神学的批判。同样,站在宗教信仰者的立场上研究神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批判。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仅仅在于,批判是严肃的学术争论,还是仅仅流于抨击。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任继愈先生就把批判神学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之中。1955年,任继愈先生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在《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一文中说道:“宗教问题,不是别的,只是世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世间的形态。‘成佛’是假